

同 伪 科 学 至 少 还 要 斗 一 百 年



“四大恶人”丛书

我是于光远

于光远 著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同伪科学至少还要斗一百年



我是

于光远

于光远 著

◆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四大恶人”

司马南

郭正谊

何祚庥

于光远





总 序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要为“四大恶人”各出一本书，汇集他们反邪教、反迷信、反伪科学的文章和讲话，邀我为这套丛书写序。“四大恶人”者，于光远、何祚庥、司马南、郭正谊是也。他们是因为战斗在反邪教、反迷信、反伪科学的最前线，才被那些搞邪教、搞迷信、搞伪科学活动的人在匿名恐吓信中送上这个封号的。被邪恶视为“恶”，从保卫科学、保卫人权、保卫社会看来就是“善”。为他们出这套丛书，是一项善举。我很乐意为这套丛书写序，算是共襄善举。

我主要是作为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的理事长（前不久换届了）和中国科协促进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联盟委员会的主任，对这方面的活动有所了解和参与的。保卫科学精神，反对邪教、迷信和伪科学，是我们研究会一个传统。在研究会第一届、第二届理事长（也是两科联盟第一届、第二届主任）于光远同志主持下，我们就举起这面旗帜，做了许多引人注目的工作。第三届期间，1994年1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若干意见》，其中特别说到：近些年来“一些迷信、愚昧活动日渐泛滥，反科学、伪科学的活动频频发生，令人触目惊心”。“要充分认识到破除反科学、伪科学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把这项工作始终不懈地坚持下去”。响应这个号召，研究会1995年在常委会上决定成立以何祚庥同志为首，彭瑞聪、胡

亚东等同志在内的“保卫科学精神工作委员会”，并在当年的全国工作会议上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由研究会发起，得到中国科协的重视，以中国科协促进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联盟委员会为主办单位，开设了以“捍卫科学尊严，反对愚昧迷信和伪科学”为主题的常设的系列论坛，首次会议这年9月在友谊宾馆开了两天，许多科学家发言，当时的科协主席朱光亚同志作总结，并且通过一份《倡议书》。第一条是向科学工作者自身提出的，倡议“科学工作者坚持科学精神，遵守科学道德，维护科学的严肃性、严密性和规范性”。“对尚未被科学界接受的假说，取认真研究、科学求证的态度。对违背基本的科学事实和规律，弄虚作假，借‘科学’之名招摇过市的行为，坚持反对”。第二条是向领导干部提出的，许多科学工作者很看重有这样一条，内容是倡议“领导干部和管理工作者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坚持被全部科学实践证明了的科学真理，支持严肃、严密、规范的科学实验和科学问题的自由讨论，支持反对迷信愚昧和伪科学活动的斗争，帮助克服阻碍这种斗争的阻力”。第三条是向新闻出版工作者提出的，内容包括“不给迷信愚昧和伪科学的传播提供载体”，引导群众“选择健康、文明、科学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第四条是向立法和执法机构提出的，内容包括“取缔各种危害人民身心健康的迷信活动和组织”，“保护向迷信愚昧和伪科学活动作斗争而受到威胁的人们的合法权益和人身安全”。这几条倡议，反映科学界的一种呼声、一种诉求，都是有针对性的。

1996年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我讲了《论保卫和发挥科学精神》的专题。同年中国科协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何祚庥、郭正谊和我就这个问题发言，新一届科协在周光召主席的支持下，继续成立两科联盟委员会，继续举办论坛的会议。

1997年政协大会期间，作为政协委员的何祚庥、郭正谊和我作了一个书面的联合发言，针对迷信和伪科学的猖獗，“心所谓危，不得不言”，说了我们的忧虑和建议。于光远同志在列席党的“十五大”期间，曾在书面发言中呼吁：如果我们不对伪科学进行坚决斗争，不进行正确的舆论引导，“十五大所确定的政治路线，将得不到意识形态的支持”。

1998年政协常委会期间，何祚庥、甘子钊、叶大年、闵乃本、谷超豪、楚庄、蔡睿贤等七位委员，提供了一份题为《猖狂的“法轮功”》材料，反映当年6月“法轮功”练功者聚众相继围攻《齐鲁晚报》、北京电视台、《中国青年报》、《健康报》的情况，问题提得相当鲜明和尖锐。1999年4月20日两科联盟纪念“五四”的会议上，于光远讲到“法轮功”和各种伪气功组织可能闹事，“显示力量”，讲到“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三尺之冰非一日可化”，不幸而言中。果然，接着就发生了“法轮功”在天津借何祚庥文章闹事的事件，就发生了“法轮功”万人包围中南海的事件。

在国家宣布取缔“法轮功”的前夕，1999年7月16日论坛的研讨会上任继愈同志作题为《不仅要脱贫，而且要脱愚》的报告，我作题为《坚持科学的唯物论和无神论》的报告。众多报纸刊物登载或摘要登载了这些报告。我还在总政、中直工委、中央国家机关工委、中央金融工委、中央党校组织的报告会上作了这个题目的报告。10月份在杭州召开的中国科协第一届年会上，印发这个报告，并作了题为《科学界应有的反思》的大会发言。

1999年12月召开的全国科普大会上，两科联盟委员会因此被评为先进集体，何祚庥、郭正谊、司马南等被评为先进个人，何祚庥代表两科联盟和他们几位先进个人发了言。

1999和2000两年，我们研究会同广西科协合作，在北京颁

发了两届“反对伪科学突出贡献”奖，第一届得奖者五人（何祚庥、郭正谊、司马南和我们两任理事长），第二届得奖者十余人（第一个在《光明日报》上揭露“法轮功”的潘国彦、因在电视台揭露“法轮功”而被解职的李波、多年在鄂西一带探访巫医的李胜光、中医研究院气功研究室主任《还气功本来面目》作者张洪林、北京医科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走火入魔》作者张彤玲等在内）。

2000年10月，于光远、何祚庥、郭正谊和我参与倡议成立以庄逢甘为理事长的中国反邪教协会，担任这个协会的顾问或副理事长。

何祚庥主编的《伪科学曝光》一连出了三集，两科联盟编印的《捍卫科学尊严，反对愚昧迷信和伪科学》文萃一连出了十余集。

除了我亲历的主要集中在北京的这些活动以外，据我所知，何祚庥、司马南、郭正谊还接受全国许多地方的党委和许多大中小学的邀请，到处作报告，受到热烈欢迎。

最近召开了表彰反“法轮功”斗争中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大会。这个会开得很好，我看了和听了几个先进代表的发言，很受感动。表彰他们，我是完全拥护的。《汉书》里有个故事，说一家人家失火了，火势很猛，邻居们奋不顾身，帮助救火，弄得焦头烂额，才把火扑灭了。这家人表示感谢，设宴请客，“焦头烂额”者为上客。但是，说故事的人提醒，在尊敬和感谢“焦头烂额”者的同时，不应该忘记，还有早提过“曲突徙薪”（弯一弯冒火星的烟筒，挪一挪易燃的柴火）建议的人们的功劳。

在反“法轮功”斗争中，是不是有早提过曲突徙薪建议的人们呢？有的。“四大恶人”便是。最早在《光明日报》发表批评《转法轮》文章的便是。向政协提供《猖狂的“法轮功”》材料的七位政协委员便是。现在揭露出来，“法轮功”围攻媒体的

事件有好几十件。这些媒体的记者，当时就或尖锐或委婉地对“法轮功”的危害，向社会公开发出警告。他们当时或受到支持，或不被理解，甚至受过委屈。现在回过头来看，应该对他们的先见和勇气，表示敬意，对他们发出的警告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引以为训。

自从政府取缔“法轮功”以来，近两年中，全国各界展开了广泛的反对邪教、崇尚科学、保护人权的群众性斗争，取得很大成绩。但是，反对邪教、迷信和伪科学的斗争，任重而道远。

邪教的本质就是反科学、反人类、反社会。最近发生的两起“法轮功”痴迷者自焚的事件，充分暴露了这个本质。那个12岁的儿童，哪里是自焚，简直是被焚！尤其要看到，“法轮功”不仅是邪教。“法轮功”教主李洪志投靠外国敌对势力，同政府对抗，愈走愈远，愈演愈烈。事实证明，李洪志一伙已经成为国内外敌对势力向我们社会主义政权进攻的一支别动队，是对社会稳定祸害极大的破坏力量。回过头来总结经验教训，我们有些见事迟，万人围住中南海已经到了很严重的地步。解放初期我们取缔过一贯道，这以后，长期没有遇到这样公开的、有层层组织的、以健身为诱饵以迷信相维系的、有众多群众卷入的团体。让这样的组织坐大，是我们今天面对的局势。取缔“法轮功”组织，转化“法轮功”信众的斗争还很复杂、很艰巨。我们要作长期斗争的准备。

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9条对“组织、利用封建迷信、会道门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如何惩处，有明文规定。这是从解放初期镇压反革命条例沿袭下来的。1985年，鉴于反动会道门复辟活动较为突出，最高人民法院等单位还发出过《关于处理反动会道门工作中有关问题的通知》。1997年修订《刑法》，第300条引进“邪教”概念，规定了“组织和利用会道门、邪教”破坏

国家法律实施的罪名，这大概也是为了同国际“接轨”吧。有人说，是1999年为了取缔“法轮功”才立法反邪教的，不对，早有立法，早就写进《刑法》了。只是一个时期有法未行，执法不力而已。所以我们取缔“法轮功”是于法有据的。

1999年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最高人民法院相继作出的规定是解释刑法的。我们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我们要像一个法治国家那样来对待邪教，依法治邪。

世界各国都反对邪教，都用法律手段制止和打击邪教活动，只是各国邪教活动情况不同，各国法治的背景和习惯不同，做法也就不完全相同。中国必须从自己的情况出发，根据自己的法律，进行自己的反邪教活动。当然，我们要借鉴和参考外国的反邪教法律和做法。

许多迷信和伪科学活动，说不上是邪教，有些邪教或类似邪教的组织，还没有李洪志那样的反政府活动，就是在“法轮功”练习者乃至痴迷者中，追随李洪志一伙从事反政府的政治活动的，也是极少数。我们在斗争中要讲政府和策略，缩小打击面，扩大教育转化面。

但是，邪教、迷信和伪科学有滋生蔓延的相同土壤。为了了解、分析、认清和不断铲除这个土壤，我们还要从社会背景上、从历史文化背景上、从社会心理和认识障碍上、从各个方面各个角度，多做研究工作，多做思想工作、社会保障和社会关怀工作。

这套丛书的出版，对于我们了解这些年来反邪教、反迷信、反伪科学斗争的历史，对于我们继续做好这方面的工作，必定有所裨益。

龚育之

2002年9月

目 录

我反对伪科学七十年·····	(1)
----------------	-----

第一编 1981年至1982年论述的介绍

两年后我开始战斗·····	(7)
寄希望于科协 and 科学院·····	(8)
1979—1982 两年斗争经过·····	(10)
附：《两年多来“耳朵认字”宣传的经过》·····	(10)
学一些特异功能伪科学历史知识·····	(27)
怎样来反对伪科学·····	(28)
附：《如此宣传的……，弄虚作假》·····	(28)
要灵学还是要自然辩证法·····	(80)
附：《要从哲学上根本解决问题——反对经验论》·····	(80)
关心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战线·····	(94)
提供两个反面资料·····	(95)
附：《意念论》·····	(96)

第二编 1983年至1998年论述的介绍

再论伪科学·····	(103)
在搞伪科学人心目中的我·····	(106)
批注《于光远先生之谜》·····	(108)
鬼文化与旅游·····	(115)

对《周易》研究的看法·····	(116)
中国的现代邪教活动·····	(118)

第三编 1999 年至 2001 年论述的介绍

极严重的现象，极严重的责任·····	(123)
反对伪科学八条·····	(131)
我和伪科学的“恩恩怨怨”	
——《南方周末》记者方进玉访于光远·····	(132)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142)
“三不”政策的由来·····	(145)
从沈昌“信息茶”到李洪志的“法轮功”	
——《姑苏晚报》记者陆玉方访于光远·····	(155)
不会带来快乐的消遣	
——建议翻阅一下《黑幕中的胡万林》·····	(160)
挑剔·····	(162)
祝贺《科学与无神论》创刊·····	(165)
科学精神的教育要从娃娃做到老人	
——《科学与无神论》记者访于光远·····	(166)
《德先生茶馆》开业贺词·····	(175)
反邪教广泛的统一战线·····	(176)
愤怒·痛心·惋惜·思考·····	(178)
反对伪科学，反对迷信，反对邪教·····	(179)

第四编 伪科学的又一品种——UFO

UFO——伪科学的又一品种

前言·····	(187)
最近我接触到的 UFO·····	(191)
介绍两本有关 UFO 的科普读物·····	(199)

UFO 的缘起	(206)
罗斯威尔事件.....	(210)
半个世纪以来目击者和与外星人有接触者的报告.....	(214)
地球人和地球文明存在的条件.....	(223)
太阳系中只有地球上有人.....	(227)
宇宙中是否有外星人.....	(234)
什么是“人”	(238)
地球人与外星人能够交往的条件.....	(241)
为什么至今还有人相信 UFO)	(248)
六十五年前我的大学毕业论文的下文.....	(253)
请大家看一篇伪科学的作品.....	(257)
麦田圈.....	(260)
关于所谓 UFO 的一封信	(263)
附录：	
美国中情局调查报告彻底解密	
——UFO 是个大骗局	(265)
质疑地外文明曾“光临泰山”	(268)
“四大恶人”聚首论道.....	(270)
卷后语	

我反对伪科学七十年

我 1915 年生于上海，1936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

我幼时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受到科学精神的教育，从来不相信鬼神、不相信命运，甚至说吉利话也不愿意。15 岁时读到英国著名物理学家 J·J·THOMSON 所著《科学大纲》一书。这书前面几个部分介绍数理化、天地生感到很好，可是看到最后一章竟是“灵学”。其中所根据的事实，我作为一个上海的土著，如扶乩请神之类都亲眼见过。我既惊讶又气愤，一个大科学家怎么能够写出这样的书?! 从此认识到伪科学的存在。后来隔了十几年，在 1949 年夏天，我很偶然地得知外国又存在“超感知觉”（ESP）与“心灵致动”（PK）这样的欺骗活动。它和 19 世纪的“心灵研究”一脉相承（后来知道 J·J·THOMSON 就是伦敦心灵研究会的重要成员）。于是我就对伪科学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1936 年，我在上海参加了艾思奇、章汉夫等发起组织的“自然科学研究会”，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自然科学工作者的外围组织。从这时起我开始从事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和科学普及工作。1939 年到延安后，我着手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一书的翻译，建国后在北京出版了这个译本。80 年代，在我主持下，又对恩格斯这本书进行了重编、注解和校译。这本书中直接与反伪科学有关的文章是从根本上破除伪科学的理论武器。

“文化大革命”前，我在中共中央宣传部任科学处处长及中央科学小组成员期间，运用我的科学知识和学得的哲学观点，对当时在我国发生的“钉螺姑娘”等所谓特异功能和伪科学事件进行了揭露。

在“四人帮”粉碎之后，在江苏徐州又出了一个名叫董小四的男孩子，他声称自己能够隔墙看东西，也能够看地下的工事。济南军区、南京军区的有些负责人也相信。传到北京，当时中国科学院的负责人李昌派了心理研究所的人去检查。心理研究所的人有一套反欺骗的办法，结果把董小四那一套完全揭露出来。

1979年3月，《四川日报》报道了唐雨“耳朵识字”。这个骗局先是被揭穿，后来又翻了案。全国各地出了许多有特异功能的小孩子，到处表演，到处欺骗。有一些党和政府的高级干部和有些学者以及传媒热衷这种伪科学的宣传。但是，耳朵识字吵得很热闹的时候，也是我们国家开始实行经济体制改革的时候。那时候我是中财委体制改革五个专家小组中的一个负责人，工作十分紧张，因此，我不敢去进行反对这个伪科学的活动。我知道这个事情不做则已，做起来要花很多很多时间。后来实在看不下去了，忍不住了，才在1980年开始参加这项战斗。我也是一发不可收拾。

我当时任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在我的倡议和领导下，成立了一个“人体特异功能调查组”。在几年的时间里，这个调查组对声称有“特异功能”者进行了深入调查和科学测试，以有力的证据揭露了其欺骗性。调查组召开了许多会议，发行了多期内部通讯和报纸，积累了大量有说服力的资料。

从1980年7月起至1982年，我就提倡科学精神、反对伪科学问题作过多次演讲，写过许多文章，并给党中央领导和有关部门写过不少信。1984年结集成《评所谓“人体特异功能”》，

由上海知识出版社出版。1982年中央宣传部有一个“休战”的决定，因此，有一段时间我没有写文章。我这方面是休战了，但是，他们并不休战，利用这个时间还在大肆活动，因此，在1983年我又投入战斗。

1996年，我把1981年、1982年两年中写的文章和1983年后到1996年中写的文章又编了一本《反“人体特异功能”论》，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在1996年12月出版。

1997年在列席党的十五大会议期间，我针对湖北鄂州市张志祥为教主的邪教“元极功”，一方面把掌握的资料交给了代表大会的秘书处，同时在分组会上作了一篇题为《绝不允许纵容、支持反动的邪教活动》的发言。这个发言的主题就是呼吁党中央积极采取有力措施，坚决制止在我国愈演愈烈的伪科学活动，并批评了那种“不准批评伪科学”的宣传政策。

1998年，沈昌在江苏把普通的茶叶说成是发了功的信息茶，高价出卖。苏州的同志和北京的《工人日报》反对他，他就到北京东城区法院控诉《工人日报》。在法院要开庭的那天，沈昌动员他的信徒包围法院。这是伪科学组织上街示威的第一次。后来我到苏州，同苏州的同志们谈话，写文章支持他们。

在无锡和南京的报刊上发表文章，支持我国政府有关机构对邪教头子“被立王”的镇压。

1999年随着“法轮功”的势力膨胀，它的活动更加猖獗。在1999年初起竟然围攻《齐鲁晚报》、《西安日报》、《中国青年报》、《健康报》、北京电视台。1999年4月20日我在两科联盟纪念“五四”的会议上，作了一个题为《极严重的现象，极严重的责任》的发言。我说，从1979年唐雨事件到那时的整个过程有七个阶段，最后第七个阶段就是上街显示力量的阶段。我说“法轮功”和其他的邪恶组织可能还会进一步闹事，显示力量。真是不幸而言中。几天以后就发生了“法轮功”包围中南

海的事件。

“法轮功”组织包围中南海，我们政府作出取缔“法轮功”的决定之后，恐怕又要开始第八个阶段。到现在是第几个阶段我还没有研究清楚。

在1999年以后到现在写的文章当中，最重要的一篇是《反对伪科学八条》。我把它看做是我反对伪科学的一个纲领性意见。

1999年以后的文章，我准备收到这本书中向读者介绍。